

特朗普与蔡英文上台深层原因的比较与思考

俞新天*

摘要: 2016年1月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执政,11月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台美关系都发生巨大变化。通过比较特朗普和蔡英文上台深层原因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可以得到三点主要的思考,即不能忽视新民粹主义的严重危害,认同危机比价值观问题更紧迫严峻,以及对局势的误判造成内外政策负面互动。由此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美国 and 台湾当局内外政策的社会文化基础,对于理解和处理未来台湾问题有所启发。

关键词: 特朗普; 蔡英文; 上台深层原因; 社会文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683(2017)05-0021-09

DOI:10.13818/j.cnki.twyj.2017.05.003

2016年初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11月美国特朗普当选新一届总统,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台美关系均发生巨大变化,变得更加复杂严峻。比较和分析特朗普和蔡英文上台深层原因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并得出结论,由此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美国 and 台湾当局内外政策的社会文化基础,对于思考未来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有所启发。

一、特朗普上台的深层原因

2016年11月,特朗普胜选为美国总统,使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出乎意料。历史的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特朗普能赢得选举有其社会文化的深层原因。

(一) 新民粹主义思潮

民粹主义是现代社会中始终存在的一股思潮。它认为统治阶级具有颓废、腐朽、没落的特性,因而必然会被人民的崛起而取代。在俄国民粹运动、美国中部民粹主义、印度甘地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中,都可寻觅到上述思想的踪迹。然而,新民粹主义却有着特殊的内涵。与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真正的人民运动不同,民粹主义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进行的反对历史前进的思想和运动。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在全球化的中心反全球化。美国 and 欧洲是全球化的领导者和推动者,30多年全球化狂飙突进,与此同时问题也堆积如山。全球化和自由化加速了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尽管总体上发达国家得益,但是具体的一些经济部门却遭受重创,很多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失业。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强化了全球化的效应,使得许多工作岗位变得过时。比如谷歌和优步正在发展无人驾驶汽车,这对300万美国卡车司机绝非福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应当加大投入,然而美国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捉襟见肘,2015年其债务与GDP的净比率为81%。这严重限制了政府克服困境的政策选择,使人民感到彻底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愿意支持一位大胆果断的领导人来改变现状,哪怕他会试图抛弃既定制度的均衡与制约机制。^[1]

其次,空前的反建制与反精英情绪弥漫。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便风起云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茶党运动。当奥巴马政府准备采取强烈措施应对危机时,美国超过40个城市的数万人示威反对,开启了茶党运动。参与者反对政府规模过大,反对增税和扩大

* 作者简介:俞新天,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

开支拉动经济,反对医保法案,反对碳减排法案。总之,运动的目的是与华盛顿的荒唐展开斗争,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他们反对“进步主义”,即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联手为人民指方向找出路,认为不如依靠自己。这与现代化的科层制(官僚制)和理性主义背道而驰。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和利用了这种情绪,他的口不择言的“政治不正确”迎合了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帮助他赢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

最后,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合流。民粹主义素有左翼和右翼之分,然而目前在反全球化、实行保护主义方面却左右合流,声势更加浩大。左翼民粹主义历来以工人、农民、少数族裔等底层民众的代表自居,支持劳工利益和福利国家,主张平等、公正和人权,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要求保护本国弱势群体的利益。右翼民粹主义持有保守的保护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经济政策上突出反对移民,维护国内就业,鼓励产业和资本回流等。当前美国的左右翼民粹主义在反对自由竞争、实行保护主义上合流,并将美国国内社会不公转移为外国夺取美国的福利,夸大安全与主权的威胁。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伟大”,赤裸裸地宣讲美国利益的“美国优先”,使得内向排外的保守倾向更加增添了合理性,并把迅速崛起的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当作替罪羊。

(二) 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和认同危机

曾经有种说法,支持特朗普的是底层人民,然而这实属误解。尽管对于投票的分析难以十分精准,但是就各种统计和访谈数据看,底层人民更支持希拉里。美国低收入的底层人群中,非白人和女性占据多数,他们传统上支持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74%的非白人和54%的女性都投了希拉里。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人群愈半数支持希拉里。特朗普和希拉里在超富人群中获得的支持率大体持平。但在年收入5万至20万美元的中产群体中,特朗普略占优势。可以说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最终将特朗普送入了白宫。

二战胜利后,美国社会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中产阶级崛起为社会主体,形成了“纺锤形”社会,奠定了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础。但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带来的产业变化冲击下,特别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衰退中,中产阶级状况江河日下。正如日本北海道大学吉田彻教授所写,从美国收入的平均值来说,2016年中产阶级数量首次在二战后跌破半数。美国传统重工业区(“铁锈地带”)的中产阶级规模已经缩小一成。45到54岁的白人的死亡率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一成。高等教育用于每名学生的公共开支在2010年后削减了三成。高中以下学历人口的失业率为9%,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即便进了大学,每名学生平均背负的债务也高达3万美元。中产阶级中失望和愤怒的情绪蔓延,大多数人都认为下一代的生活将不如自己。^[2]

调查发现,特朗普支持者的代表形象是居住在城市周边、本科以下学历、有收入的白人男性,家庭收入较平均值高出一成以上。他们多为拥有制造业稳定工作、有自己的房产的“没落中产阶级”,其中不少人是经济转型催生出的“全球化的失败者”。特朗普的支持者与茶党运动的参与者高度重合。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对1988年至2008年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比较后证实,新兴国家的富裕阶层收入的中间值在渐进式增长,而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收入平均值却未增长。

中产阶级的愤怒导致了美国的认同危机。美国是移民国家,但过去“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文化和价值观点占主导地位,其他因素则被“大熔炉”所同化。但是现在黑人、拉美裔人上升比例远超白人,如果加上亚裔人,再过50年,少数族裔人口将超过欧裔白种人。拉美裔和亚裔还强烈要求不能以英语为唯一法定语言。在很多州,西班牙语已取得了与英语并用的合法地位。十几年前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已经尖锐地揭示了美国人“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困扰,现在变得更加严重。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对少数族裔的依赖,又引起了白人群体的不满。根据尼皮亚克大学(康涅狄格州)发布的民调,特朗普拥护者中85%的人认为,美国失去了它的身份。^[3]不少白人中产阶级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必须起而捍卫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和种族包容。美国社会内部的对立和冲突愈益尖锐,原先相对一致的美国公民认同已经瓦解成破碎的族裔认同和个人身份认同。

更为严重的是,认同危机会寻求和制造外部敌人,以便解脱困境,凝聚内部,巩固自己统治。特

朗普的战略安全顾问史蒂夫·班农于2014年参加人类尊严研究所(Human Dignity Institute)的会议时提出,以犹太-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世界正处于危机之中。目前出现了必须抗击的三大趋势。第一种趋势是违背犹太-基督教信仰的资本主义形态,包括国家资本主义(例如中国和俄罗斯)和安·兰德资本主义(使人商品化、物化的自由资本主义)。第二种趋势是西方大规模的世俗化。对于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说,流行文化压倒了宗教信仰。第三种趋势是西方正处于一场对抗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全面战争之中。因此,中产阶级,工薪阶层的中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是美国的核心。一场全球范围的茶党运动正在发生。^[4]班农的说法带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也吸收了“文明冲突论”的观点,还暗含着种族主义的内容,但却被不少白人中产阶级所接受。

(三) 内政与外交的负面互动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政治学的格言已远远不足以解释今天复杂的现象。在全球化的深化下,内政与外交紧密相连,难以分割。如果内政与外交达到正面互动,则治理成功。然而现在美国的内政失效,对立空前,因此美国民众对于内政的不满必然延伸到对外政策上。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说中说,数十年来,外国竞争者在损害美国业界利益的情况下发家致富,华盛顿还为外国军队提供援助。美国向外国提供“数以万计”的援助,本国基础设施却连年失修,本国边界却无人守卫。他说出了许多美国人的心声。美国政府治理不善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怨气,迅速地与外交政策挂钩,归咎于外资、外国、移民等因素。内政与外交的负面互动增加了美国人的不满,孤立主义情绪高涨,支持特朗普来改弦易辙。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以它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为此而提供了相当的公共产品。它给美国带来的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大到难以估量。然而,正如约瑟夫·奈所分析的,美国人对于外交政策一直有争论,而且有党派的差异,目前世界秩序的可取性与可持续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一些批评者认为,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代价超过了它所带来的好处。另外一些人批评,全球力量正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转移,已经削弱了秩序的基础。还有一些人认为,由于政治、社会和技术的持续变化,秩序正受到实力从政府向非国家行为者广泛分散的威胁。不仅如此,美国对外军事干预的失败也让美国民众对外交的支持减弱。^[5]

特朗普上台后的种种举措证明,深层的社会动力比个人意愿还要强有力。特朗普当局必然要顾及民众的要求,回应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批评美国建制派的政客,表示现在政府真正地归还人民手中,重弹民粹主义老调。特朗普提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承诺振兴美国工业,增加就业岗位,显然给惊恐不安的中产阶级打了一剂强心针。特朗普上台后即重启从加拿大到美国的长达2000公里的输油管道项目。奥巴马曾因环保否决该项目,但特朗普称它可创造2.8万个工作岗位。特朗普还承诺在基建方面迅速推动“一万亿计划”,在美国建造新的道路、高速公路、机场、隧道和铁路。而他缓解美国人对外交不满的对策是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优先”,“保护将带来伟大的繁荣与力量”。贸易、税收、移民、外交的每一项决策都要有利于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在让“美国再伟大”的口号下,国际合作、互相依存、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责任已杳无踪迹。然而,特朗普的举措是否对美国问题对症下药,能否药到病除,仍然令人怀疑。特朗普把经济全球化看作“牺牲美国产业,养肥他国产业”的零和游戏,把美国说成全球化的受害者,无视国际分工推进,相互依赖增强的现实。保护主义将导致美国投资环境恶化、生产效率低下和物价上涨,只会扩大贫富差距,不会给美国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在安全领域内,无论是反恐还是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靠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无法确保国际和平。

二、蔡英文上台的深层原因

把蔡英文与特朗普上台的深层原因相比较,可以发现巨大的相似性,三个主要原因是一样的,只不过台湾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这些特点更值得探讨。

（一）民粹被操弄，青年打先锋

台湾的民粹主义在“民主化”之后不断高涨，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强劲。在西方国家，知识精英已经对于民主制度进行批评性反思，有人甚至指出，选举和多数决定并不能真正体现人民自主的精髓，而协商共识应当成为制度安排的重要环节。然而，在民主后发的台湾民众中却仍然充满对于民主的狂热和迷信，民粹主义假“民主”、“人民”之名盛行。民进党在背后操弄，使民粹主义反开放、反建制、反理性的情绪和行动登峰造极。正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民粹运动使岛内气氛陡变，最终把蔡英文和民进党送上台。从这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台湾民粹主义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其运动的暴烈程度远超美国。“太阳花学运”反对两岸通过的“服贸协议”，认为这会让中资企业“来台竞争”，要“站出来守护”台湾，反对全球化下的开放合作，主张关门保护。尽管许多专家学者详细地分析了两岸“服贸协议”将给台湾带来巨大利益，是大陆惠台让利的举措，然而青年学生非理性的情绪其势汹汹，听不进任何理性声音。如果说美国民粹主义运动还只是“占领华尔街”，那么台湾的青年则藐视法律以暴力占领“立法院”数天，后又冲进“行政院”占领。

特点之二是特别针对中国大陆，把经济联系与安全威胁挂钩。在“太阳花学运”中，2014年3月18日“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发表《宣言》，把大陆视为“生存威胁”，威胁台湾的“言论自由”，宣扬所谓“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像吸血鬼一样”“吸干青年的血汗”，“断送台湾未来”。很多台湾人相信流言，说100万大陆人将进入台湾，抢占洗发美容印刷业，让中小业者失业，“洗发又洗脑”。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论调却广为散布，把大陆形象妖魔化，对两岸关系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

特点之三是青年成为其主力和先锋。在美国与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中，青年是对全球化和开放支持程度最高的人群。在各种民调中，青年对于全球化的支持度要高于中老年人群的10%以上。但台湾的情况与欧美不同，青年世代更加内向与保守，更倾向于民粹主义。这并非如蔡英文所说的年轻人具有“天然独”，而是从李登辉至陈水扁20年“去中国化”教育的结果。青年受到“台湾主体论”、“同心圆理论”等谬论的影响，割断与中国大陆的联系，甚至于把李白、孙中山视为“外国人”。近年来中国大陆迅速崛起，增强了台湾青年的“恐中”、“反中”的情绪。他们完全远离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视野，只能蜷缩在岛内“小确幸”的天井内孤芳自赏。根据“台湾智库”的民调，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66%，为10年来最低，但年轻人投票率高达74.5%。其中年龄20岁至39岁的选民，票投“朱（立伦）王（如玄）配”仅1成，有超过5成投给“英仁配”（民进党蔡英文、陈建仁）。首投族70%以上的票投给了民进党。^[6]

（二）中产阶级不满，“台湾认同”高涨

台湾作为一个较发达经济体，中产阶级也是社会的主体。进入本世纪后，特别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台湾中产阶级的危机感空前提高。因为一是失业率上升。2000年之前，台湾的失业率一直在2%左右，现在则达到6%以上。尤其严重的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失业率居高不下，25岁至29岁年龄组失业率最高。二是贫富不均加剧。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的研究显示，从1997年起，台湾前10%所得者占台湾总所得比，从23%升至2012年的36%；前1%所得者，占比从6%升至11%。^[7]扣除货币通胀后，薪资多年停滞，甚至有的年份出现负增长。这使许多中产阶级不满，担心沦为“新贫”。中产阶级的态度决定了多数选票的流向，成为蔡英文上台的基础。

中产阶级的不满是一个世界普遍现象，然而台湾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中产阶级的不满被民进党放大夸大，引向争取“公平正义”的政治斗争，更将其怒火延烧至大陆。相对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台湾的状况并未如此恶劣，否则也不可能享有“小确幸”的生活。这说明大多数中产阶级并未不满到失望的程度。马英九执政8年里，颁布了一系列缓减中产阶级压力的福利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如出现了科技人员的海外回流潮。为什么台湾中产阶级反应要比预期的更强烈，主要是因为民进党的经营。自2010年“五都”选举始，蔡英文和民进党就努力摆脱陈水扁“政商结合”的不良形象，把民进党打扮成支持社会中下层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把“公平正义”的旗帜打出来争取选举胜利，把马英九当

局说成支持“财阀”的“权贵”。蔡英文在她的文集《英派》里写道：“全球经济加大贫富差距，在台湾已产生阶级与社会矛盾；此时两岸加速经济交流，又出现扭曲的政商利益结构。两者产生的分配问题产生加乘效应，终于演变成世代之间的冲突。”^[8]民进党把贫富分化、世代差异与两岸关系紧密联系，为“台湾主体性”甚至“台独”火上浇油。当“太阳花学运”秉承民进党理念，以暴力抗击“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时，蔡英文及民进党大老一齐参加静坐，为其背书。从“太阳花学运”到2014年底“九合一”选举，再到2016年“两合一”选举，都是操弄“公平正义”取得胜利的结果。

台湾中产阶级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不满不仅针对经济和社会议题，而且表现为文化的焦虑，即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困惑。正如日本专门研究台湾选举的专家小笠原欣幸所指出的，虽然台湾人对马英九当局的不满很大程度上在于经济问题，但多数选民关注的是“在重视台湾认同的同时希望经济变好”而不是“只要经济好，台湾认同怎样都无所谓”。^[9]目前“台湾认同”空前高涨，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思潮。“台湾认同”综合了台湾人对于土地家园的眷恋，对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民主政治的实行，台湾社会自治以及个人自主的肯定与自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从李登辉至陈水扁20年变本加厉的“去中国化”政策，加上民进党长期歪曲诋毁两岸关系的谬论广为传播，使得“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疏离乃至对立，不少人甚至接受“2300万台湾人决定自己命运”和“台独”理念，已成为支持民进党的社会基础。

（三）内外政策失败，拖累两岸关系

台湾内部治理陷入困境，对外政策应对失据，尽管两岸关系的改善为其提供了空前机遇，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却未能善加利用，错失良机，反而拖累和损害了两岸关系。

应当承认，自2005年至2014年，台湾GDP年增长3.92%，高于同期的韩国（3.69%）和香港（3.91%），仅低于新加坡（5.89%），在世界发达经济体中并不算差。^[10]但是，台湾也与许多发达经济体一样，财政能力孱弱，无法支持经济发展。台湾经济发展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0年代初的30%，锐减至2014年的15%。尽管马英九提出“黄金十年”规划，然而众多规划无法顺利落实，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被百姓称为“跳票”。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至2011年已达20%，特别表现于“老农年金”和“全民健保”，已达饱和停滞状态，无法对青年创业、企业升级和中南部解困提供有效必要的支持。扣除通胀指数，军公教的薪资十年不涨，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相对下降。马英九领导能力薄弱，在“证所税”、油电涨价、“军公教优待”、基层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决策错误，造成执政公信力的下降。同时，“马（英九）王（金平）政争”引发国民党内部的对立，此后国民党中央的“换柱（洪秀柱）”风波，以及不分区“立委”名单对派系和个人私利的考虑，不仅让国民党普通党员灰心丧志，也让中间选民失望至极。

马英九一上任便确定“亲美友日和中”和“不统不独不武”的路线。马英九认识到，台湾只有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尽管马英九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保持了良好的美台关系和迅速改善的两岸关系，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然而其政策的两面性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和后患。马英九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两岸关系上不给美国制造麻烦，控制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强调台美在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一致性，支持和表示加入美国倡导的TTP，寻求美国给予台湾“安全”保障。马英九当局与日本签订“渔业协议”，却拒绝与大陆进行海洋合作。当美国对台湾施压时，马英九的抗压力薄弱，节节败退。马英九主张签《两岸和平协议》，美国一踩刹车，他就立即放弃了。他原来的“终极统一”目标，也在内外压力下改为“不统不独不武”的机会主义，看来不偏不倚，却让国民党丢旗失魂，自我精神阉割。

马英九当局的最大政绩是改善与发展了两岸关系，实现了“大三通”，开创了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新局面，直至达到了“习马会”的巅峰，和平红利成果丰硕。且不说台湾扩大了国际参与，两岸关系进入官方机制性交流，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通报食品安全信息，只在经济领域，2014年两岸贸易总额达1744亿美元，较2007年成长34%，台湾顺差达749亿美元，但出口依存度未增长。^[11]目前岛

内谬论流传,说两岸关系导致台湾经济衰退与社会不公,实在混淆黑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流中,台湾还能幸存,甚至屡有几次经济小升,全仗大陆施援。可惜马英九当局未能通过政策施为,以二次分配调整市场经济的缺陷,让更多台湾人民分享和平红利。目前大陆的治理不能及于台湾,世界上哪有要贸易对象来改变社会内部问题的道理?更有甚者马英九当局对于民进党和“台独”势力斗争不力,在“一中”原则上暧昧含糊,结果助长了岛内民粹主义的气焰,失去了把民众引上正确方向的主导权,最终也使国民党丧失了执政权。

三、对台湾问题的启发与思考

特朗普与蔡英文上台的深层原因既有各自的特点,又反映出共性,比较其同异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认识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政策根源及趋向,而且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启示与思考。概而言之,政治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利益去解释。经济行动常是人类行为的重心,但它很难全面地解释人类的行为。虽然很多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预设,但有时与狭窄的利益定义不符的其他动机也在起作用。经济学关于利益最大化的预设非常重视个体的利益和选择,但有时候群体的利益和选择更加有力。而且,利益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只是部分地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若要洞悉利益的作用,就应研究群体与个体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试图最大化的利益是什么,而不是事先假定他们是什么,或者简单化地得出结论。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特朗普和蔡英文个人的关注和研究不少,对特朗普政府和蔡英文当局的政策分析和预测更多,然而对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认识不足。本文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下三点思考,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未来台湾当局政策及民意走向的作用,以便深化对台湾问题的理解。

(一) 不能忽视新民粹主义的巨大危害

新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泛滥,其危害性不容忽视。许多人轻视社会思潮的作用,认为只有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才是实在的斗争,思想文化的错误认识如水上泡沫,掀不起大浪。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历史证明,大规模的思潮变迁往往预示着事物的发展方向,进而促成意想不到的变化。例如欧洲狂热的沙文主义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法西斯主义兴起为德意日侵略战争鸣锣开道。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环境对于观念和思潮不仅可能有间接的影响,比如通过影响制度和联盟激励,而且还可能由培育观念和思潮的国际气氛直接施加,比如直接效仿运动或行为,运动领袖的跨国性传播经验等。

台湾的民粹主义借民主化而起,岛内早已变成不问是非只讲立场之地。世界民粹主义思潮日渐风行,台湾民粹运动愈演愈烈。可以明显看到,“太阳花学运”效仿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茉莉花革命”等的方法手段,只不过表现更为暴力激烈。现在美国和欧洲新一波民粹主义空前高涨,台湾民粹主义也将更加有恃无恐。2017年3月31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太阳花学运”主要人物黄国昌、林飞帆和陈为廷等22人全部无罪。蔡英文发言人林鹤明当日宣称:“太阳花学运”是台湾民主进一步深化的里程碑,也提醒大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时代力量”“立委”当事人黄国昌说,“判决从宪政民主高度,肯认公民精神”。台湾网络作家柳丝儿写道,台湾司法已死,民主自由已死,从此台湾可以堂而皇之与民粹、集权挂钩,进入“暴民政治时代”。^[12]在民进党当局庇护下,民粹主义的暴戾之气笼罩台湾,其还可能对大陆和两岸关系造成什么更严重的损害,值得密切关注。

尽管从理论上说,现在民进党完全执政,反建制反精英反开放的民粹主义也完全有可能针对民进党当局,保护主义也可能指向美欧日,然而现实却是,台湾民粹主义几乎主要把大陆视为对手甚至敌人。这是因为民进党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把台湾社会的矛盾说成“权贵”“财团”和人民之间的“阶级斗争”,用以打倒对手国民党;在2008年之后更引伸为“两岸权贵和财团”联手剥削“台湾人民”的谬论,以便一石二鸟地打击国民党和两岸关系,为民进党执政披上“公平正义”的外衣。与国际左翼右翼民粹主义合流一样,台湾民粹主义也将“公平正义”与“安全主权”联系在一起,声势更大,

迷惑力更强。民进党当局利用台湾人民对大陆崛起的误解和担忧,制造“远中”、“恐中”、“反中”的谬论,为民粹主义火上浇油。再加上日本和其他的国际势力插手其间,幕后操纵,使民粹主义成为制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阻挡中国统一进程的一张牌。今后中国大陆必须针对台湾“公平正义”和“主权安全”两方面的谬论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建立有效新论述。由于民粹主义带有极大的非理性情绪,中国大陆还必须从心理疏导入手,去争取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归心。

(二) 认同危机比价值观问题更紧迫严峻

通过对美国和台湾的实例比较,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即认同危机突显,成为紧迫而严峻的课题。认同是从个人身份开始,进而达到群体的归属,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丰富内涵。认同涉及价值观的赞同,但比文化和价值观更加广泛深刻。英国与欧盟各国、美国的白人和少数族裔,在价值观上并无太大差异,然而却因认同分歧矛盾冲突,甚至分道扬镳。认同危机已成为世界普遍的现象,而台湾的认同危机尤为严重,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台湾认同”的上升已经十分明显。“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疏离甚至敌对,是民进党及“台独”势力长期经营的结果。根据台湾TVBS2013年所作的民调显示,民众中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为78%,而20—29岁的青年比例更高达89%。民众中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为13%,而青年是11%,为所有年龄层中最低。个人身份的认同影响了台湾人的“国家认同”。他们进而认为“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或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13]在他们眼中,中国大陆不仅是“他者”、“他族”,而且是要文攻武吓,企图吞并台湾的“威胁”。“远中”、“厌中”、“恐中”甚至“仇中”的情绪严重损害两岸人民的认识和感情,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统一的深层障碍。

“台湾认同”高涨的原因众多,独特而复杂的历史遭遇,日本的殖民统治,国民党的反共教育,李登辉与陈水扁的“去中国化”,已经有许多分析和论述。本文要进一步补充分析一些新近的原因。首先是台湾民主制度的弊病。台湾采纳了西方民主制度,并以“亚洲民主灯塔”而自傲,然而西方民主制度带有根本缺陷,无法解决认同危机。陶文钊指出,美国社会分裂体现于方方面面,已经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美利坚分裂国”^[14]加拿大专家泰勒认为,仅仅投票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对民主制度是不够的。人民必须共同讨论协商,每个人都改造和塑造自己的意见,达到融合。^[15]台大政治学教授张麟征感叹,跳不出意识形态,不能面对国际及两岸的现实,……终将使蔡英文政权受到内外冲击,台湾前景黯淡。民主政治果然是自作自受的政治!^[16]

其次,它源于对于大陆迅速崛起的担忧恐惧。“身份”与“认同”在意义上可以共通,但是“身份”往往被社会网络的整体格局所规定,“认同”则是人对自己所处身份的承认,前者反映了客观的关系,后者更多取决于主观的理解和设想。正因为认同具有主观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比客观的规定性更能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外部的压力越大,群体的凝聚力和亲密性就越强。政客往往利用和操弄民众的情绪,寻找和制造外部“敌人”,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蔡英文的民进党当局正在这样做。她拒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却把国际参与的困局归咎于大陆“打压”,鼓励“远中”、“恐中”、“仇中”,造成两岸冷和对立的气氛,民进党可借此连任甚至“长期执政”。

长期形成的认同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因此中国大陆争取台湾人心的工作应当耐心地聚焦于这一主要矛盾。仅仅强调以中华文化来拉近两岸人民的距离,并未对症下药,今后应在建设共享的认同上着力。首先,文化及价值观产自于历史、语言、宗教信仰、习俗等,较多回顾过去,不能完全决定现在人民的认同和未来的认同取向。即使欧盟国家之间享有许多共同价值观,也未必达到欧洲认同。因此,共享的认同比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更加复杂深刻。共享的认同必须有两岸人民更多的共同实践,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才能得到实现。其次,共享的认同必须在两岸人民对自己的身份有明确的定义上,互相之间再有认同,形成紧密团结的共同体,显然它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融合,而不仅

仅是文化、信仰和风俗的一致。最后，共享的认同还要容纳各自归属于一个国家的不同方式。两岸人民对于一个中国的理解和想象必然有差异性，因此容纳不同方式的归属，让人民感到获得尊重，通过法制加以保障，是非常重要的。

（三）对局势的误判造成内外政策负面互动

显然，目前世界各国都更加“内向”，优先重视解决国内面临的紧迫问题，在迅速变化的国际格局中稳定自身，巩固基础，然后才能增强对外的能力和影响。但是，各国“内向”的程度与内容又与其对世界局势和地区秩序的判断相关联，其政要和精英必须在世界和地区中定位本国，寻求最有利的内外互动渠道和方式，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特朗普确实认识到美国国内累积的问题如山，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困局，振兴美国经济与民生。与此同时，特朗普及其团队又在力量捉襟见肘时要求其盟国和世界各国不能“搭便车”，要分担责任，为美国做贡献。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念颇遭质疑，但在其百日执政时却出现了向原有的外交轨道回归的倾向。美国必须也可能与中国合作，承认一个中国就成为前提。未来中美关系必将进一步互比较量、互相影响和互相塑造。大格局已定，蔡英文的民进党当局已不能跳出其框架限制。

然而，对于内外局势的判断却未必符合实际情况，民进党的误判引导它继续走向泥淖。蔡英文当局目前主要的议题在岛内，她在“转型正义”的旗号下，要彻底搞垮国民党，以便连选连任。表面上看她在回应民众搞好经济改善民生的要求，但是在制订政策时，又在“改革”的口号下稳固自己的政治基础，以绿营的理念进一步改造台湾社会。怀着一党私利的目标，民进党当局不可能为民谋福。蔡英文执政不满一年，已经弄得天怨人怒，民调跳水。根据亲绿的“台湾民意基金会”4月24日公民的执政党满意度，不满民进党的民众高达59.1%。^[17]但是，蔡英文认为绿色民众会支持她，只有三成绿色民众对她不满。年轻人尤其支持她。根据民进党民调，年轻人对她的支持度高达56%，而29岁以下支持度则有64%^[18]。只相信绿色民调，只相信自己希望的结果，民进党当局继续走下坡路是无庸置疑的。

台湾当局如何评估特朗普上台后的国际局势？绿营智囊颜建发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认为，特朗普会以美国利益为主，但不会撤出亚太。美国会把中国作为主要威胁。美国对台的支持还会继续。台湾别无选择，一定要靠主流，抓紧美日政策的方向。^[19]在2017年3月10日“全球台湾研究所”和全美亚洲研究局举办的“美台政策未来”研讨会上，美国台海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说，以前有民调发现，80%台湾人觉得如果台湾遭到对岸攻击，美国一定会保护，而实际上美国可能只有18%的人愿意出兵护台。他说，“他们对美国有非常不现实的想法，我感觉就像是想免费搭车”。^[20]台湾未来无论成为美国的棋子，还是弃子，前景不妙，对一直高喊台湾“自主性”的民进党当局都是莫大的讽刺。

总体上，蔡英文实行“远大陆亲美日”的政策。由于陈水扁“法理台独”被碰得头破血流殷鉴不远，蔡英文以模糊的言辞定义两岸关系，以“不挑衅”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实际上，台湾当局又大搞“柔性台独”、“文化台独”，妄图让两岸人民渐行渐远。蔡英文拒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却又想获得经济利益和国际参与的成果，显然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台湾当局对岛内、国际和两岸的判断都陷入盲目，内外政策的负面互动不可避免。其最终后果可能就是，蔡英文会祭出惯用的法宝，制造“敌人”，归咎于大陆“打压”台湾，两岸关系只能恶化，难于改善。

注释：

[1]〔美〕法里德·札卡里亚：《民粹主义高歌猛进——为什么西方陷入麻烦》，美国《外交》双月刊，2016年11/12月。

[2]〔日〕吉田彻：《民粹主义蔓延体现“没落中产阶级”的不满》，《日本经济新闻》2016年12月15日。

[3]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p. 62.

[4]《特朗普顾问班农：当今世界最大威胁是这两个》，中国评论网 <http://www.CRNT.com>, 2017年2月28日。

- [5]〔美〕约瑟夫·奈：《自由主义秩序会幸存下来吗？一种思想的历史》，美国《外交》双月刊，2017年1/2月（提前出版）。
- [6]《台湾智库：年轻人投票率74.5% 补刀终结国民党》，<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579950>，2016-01-21。
- [7] 彭涟漪：《贫富不均 重去台湾》，台湾《远见》杂志，2015年3月号。
- [8] 转引自郑振清：《分化社会挑战民主政治—台湾政治周期及其经济社会根源》，《文化纵横》2016年4月号。
- [9]〔日〕小笠原欣幸：《2016年台湾“总统”、“立法委员”选举分析》，小笠原网站：<http://www.tufs.ac.jp/ts/personal/orgasawara/big5cn.html>（中文）。
- [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2015>。
- [11] 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网站, <http://www.sef.org.tw/ct.asp?xItem=925459&ctNode=4702&mp=1>。转引自赵建民：《从和平发展到“冷和平”：两岸关系回顾与前瞻》，《台海研究》，2016年第1期。
- [12]《台判“太阳花学运”分子“全无罪”》，《环球时报》2017年4月1日。
- [13] 陈孔立：《“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构建》，《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
- [14] 陶文钊：《“特朗普现象”剖析》，《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6期。
- [15]〔加〕查尔斯·泰勒：《没有共同体，就没有民主》，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
- [16] 张麟徵：《国民党与台湾：一体同命》，台湾《海峡评论》，2016年3月1日。
- [17]《绿执政一年近六成不满意，游盈隆：严重》，香港中评网 <http://www.CRNTT.com>，2017-04-24。
- [18]《民进党民调：4成4年轻人满意蔡执政》，香港中评网 <http://www.CRNTT.com>，2017-05-09。
- [19]《中评论坛：：特朗普影响美中与台湾》，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网，2017年1月29日。
- [20]《八成台湾人觉得美会保台？美专家批免费搭车》，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网，2017年3月13日。

（责任编辑 刘佳雁）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into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and Tsai Ing-wen

Yu Xintian

Abstract: With the election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s Tsai Ing-wen as leader of Taiwan in January 2016 and that of Donald Trump as U.S. president in November 2016,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for Sino-U.S., cross-Taiwan Strait and Taiwan-U.S. relations.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ir election, this paper reaches three conclusions: (1) the danger of new populism cannot be neglected; (2) the crisis of identity is more grave and urgent than the value gap; and (3) misjudgment of the situation would bring about neg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This paper helps to recogniz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sis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thus contributes to thinking on tackling the Taiwan issu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Donald Trump; Tsai Ing-wen; Underlying Cause; Social and Cultural Basis